

『西游』故事的来龙去脉

张所宇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书中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事实上，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西游》故事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我们熟知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在没有影视剧的古代，《西游》故事又是如何传播的呢？

壹 西游故事的源头

众所周知，“唐僧取经”是《西游记》故事情节的雏形和发端。唐僧的原型，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就来源于玄奘取经的真实历史事件。公元629年，玄奘为了探求佛法的真义，决定到当时的佛教圣地天竺（古印度）求学。他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过星星峡、流沙河，再穿越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登上帕米尔高原。一路上，他穿越多个沙漠，曾连续多日滴水未进；他忍受过高寒缺氧，曾亲历天山雪崩，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凭借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抵达天竺。在那里，他拜访著名寺院，刻苦求学，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名震天竺，17年后才回到大唐。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的《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编撰，记载了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民族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与小说《西游记》中的情节不同的是，玄奘西行时不仅没有帝王送行，还是偷渡出去的，但是由于他取得的成就，唐太宗不但没有治他的罪，还在当时的长安城专门为他设立了讲经的地方，组织人协助他翻译经书，这对当时文化的交流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贰 从玄奘取经到《西游记》

回到大唐的玄奘，受到了人们的尊崇，有关“玄奘取经”的故事也开始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最早的故事都和玄奘在西域的艰险历程有关。玄奘的两位弟子写成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是记述玄奘西行的取经事迹，但对他的成就加入了很多夸张和渲染，书中插入了大量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使故事的传播性大大增强。此后，取经故事不断被加工、润色，离真实情况越来越远。我们在一些早期的壁画、文献中，可以看到早期“西游”故事的流传轨迹，也能发现唐僧和3个徒弟的形象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迄今发现最早描绘唐僧取经故事的画作，出现在敦煌、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一共有6幅，画面中不仅有唐僧，还有“猴行者”，也就是后来的孙悟空。刊行于南宋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具备了《西游记》的雏形。书中记载的“猴行者”取代唐僧，成为故事的主角，其中的“深沙神”就是沙僧的前身，但故事中并没有出现“猪八戒”的形象。元代的《西游记平话》中，不仅有“车迟国斗圣”的故事，与《西游记》的记述大体相同，还出现了“沙和尚”以及“黑猪精八戒”的形象，其故事与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非常接近。诸多证据表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磁州窑褐彩唐僧取经图枕，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西游”故事在民间的普及，以及百姓对这个故事的喜爱。从宋到明，“西游”故事也在戏剧舞台上不断演绎，并在元杂剧中第一次被命名为《西游记》。

叁 孙悟空形象的由来

到了明代，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在历代平话（话本体载之一）、戏曲的基础上，融入深刻的社会主题，创作出规模宏大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使师徒4人的形象更加丰满，尤其是孙悟空的形象，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孙悟空的形象，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据资料记载，在吴承恩的家乡，自古淮水为患，很早就产生了与治水有关的神话。传说，大禹治水时收服的淮水神无支祁，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这一神话从唐代开始流传，在历代传奇中都有记载。唐代的《古岳渎经》中就记录了这个故事。此后，从宋元话本到元明杂剧中，都能看到无支祁传说演化的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了无支祁传说与孙悟空形象之间的关系，他说：“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埋昧也”。

肆 《西游记》故事的普及

小说《西游记》成书后，“西游”故事更加丰满，但其在民间的流传，还是以各类戏剧和画作、图册等为主。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游记图册》，便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来展现《西游记》故事。这本图册分为上、下册，折叠式装裱，图册为绢本、设色，根据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第1回至第20回绘制，设色艳丽，十分精美。图中的山石采用传统的青绿绘画技法，突出山峰的险峻；画中人物则采用工笔画法，描绘得非常细致。这本图册的创作者已无从考证，除了绘画部分以外，图册中还有写有每一回的标题和点评，这些文字是由清代书法家陈奕禧书写的。古代没有影视传播手段，因此图册的传播价值更为突显。明清时期，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许多文学名著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些名著在民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图册。明清时期，各地书坊林立，小说、戏曲、诗词类书籍大量刊印，书中插图图成成为一种时尚，当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几部文学名著，几乎都有版画插图。除《西游记图册》外，国家博物馆还珍藏有根据《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绘制的图册或图卷。在这些图册中，画家以细腻的笔法、流畅的线条，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图文并茂，将故事描绘得十分生动。这些图册的流传，使作品的传播更为广泛。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丰满起来的《西游记》，集民间智慧与小说家高超的创作技艺于一身，以书画一体的形式不断普及和演绎，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学名著中的精彩故事，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本版致力于打造文史研究和交流平台，欢迎全国各地的历史学者、研究者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身份、工作单位、地址和联系电话。投稿邮箱：ccrbws@126.com 组稿记者：毕春慧

古人消暑有妙招

钱国宏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暑热难耐，现代人想尽各种方法避暑纳凉，而在科技远没有今天发达的古代，人们会采用哪些方法消暑呢？其实，我国古人发明了很多消暑妙招，而且历朝历代不断创新，甚至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消暑文化”。

纸扇轻摇风自来

手摇扇子来纳凉，这是古人最常见的消暑方式和习俗。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纳凉用的扇子，后世一直沿用不衰。扇子材质较多，有苇扇、蒲扇、纸扇、帛扇、绢扇、羽扇，款式有直柄扇、折扇，还有富贵人家、官廷中使用的超大号人工摇扇等等。不管材质、样式如何变化，扇子的功能始终没有变：“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白居易《白羽扇》）正因为如此，古籍中常把扇子亲切地称为“摇风”“凉友”。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时，人们制造出一种“纳凉神器”——“叶轮拔风”。《西京杂记》中记载：“长安巧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这种“神器”的威力堪比现代的电风扇。

更围高屋搭凉棚

搭凉棚，挂竹帘，糊冷布，都是古代比较普遍的纳凉方式。据《北京风俗杂咏》记载，旧时入夏后，官廷和富贵人家都要在庭院、官殿上，用布或苇席搭成凉棚，用于遮阳、纳凉。“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盛夏时节，三五知己坐于凉棚之下，高谈阔论，吃瓜饮茶，好不惬意！

冰块冰食散清凉

现代人有了冰箱、冰柜，想啥时候吃啥都能吃到，古代虽然做不到，但古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造冰、储冰。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冬季储冰夏季用，《诗经》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记载，意即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当然，那时夏季能用冰块降温解暑的恐怕非富即贵，普通百姓是用不起的。周代的官廷中，甚至还设有“凌人”一职，专门掌管储冰工作。唐宋时期均有皇帝举行官廷凉宴和赐冰给大臣的记载，明清两代几成定制，明代有“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的记载，清代有“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的记载。可见，明清两代，“发冰票”“赐冰块”成了一种“待遇”。

檐上飞流坠如雨

古时候，皇宫内院和民间富贵人家还采用一种气势磅礴的纳凉祛暑方法——人造瀑布。用翻水车把凉水提到屋顶的储水池中，再让水沿房檐四周流下，形成人造瀑布，借以降温解暑。“江果瑶池实，金盘露并冰。甘泉将避暑，台殿晓光凝……”（张仲素《杂曲歌辞·宫中乐》）《唐语林》中提及：“宅弟有一雨亭，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宋代的《武林旧事》中也有“寒瀑飞空，下注大地可十亩”的记载。后来，人们为了节省水，又发明了一种“循环瀑布”，借助风力，通过器具，将瀑布流下的水提到高处，再形成新的瀑布，其中大概蕴含着古人最初的环保理念吧！

携杖来追柳外凉

古代的一些文人雅士，喜欢到野外的树荫下、荷塘旁等风景绝佳、车马绝迹之处乘凉消暑。诗人杨万里写有《夏夜追凉》一诗，描述的便是这样的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陆游的《纳凉》诗（一说作者为秦观）与此诗异曲同工：“携杖来追柳外凉，过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月明星稀，船笛悠扬，微风拂面，荷香入髓，令人神清气爽。沐浴清风，闲步乘凉，这可能是古人最天然、环保、省钱、省力的一种消暑方式了吧。

浮瓜沉李解暑烦

赤日炎炎，吃些清热解暑的食物，也是古人的消暑方式之一。西瓜、荷叶、绿豆汤、鲮羹、银苗菜、新莲、避暑汤等，都是深受古人喜爱的消暑食物。《膳夫录》中记载：“汴中节食，伏

日绿荷包子。”西瓜有清热解暑，除烦止渴、利小便等功用，从宋代开始，盛夏吃西瓜便成为大众熟知的一种消暑方式：“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方回《秋大热上七里滩》）荷具有清暑利湿、生津止渴等作用，所以，古人赏荷之余，也用荷制成美食来消暑，开发出“荷水”“莲子羹”“荷叶茶”“莲子饮”等一系列“荷族凉食”。古人在食用解暑瓜果前，往往还要“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吃起来更添清凉。

一枕清凉入梦来

用睡瓷枕的方式来纳凉，这种消暑方式就有些精致的味道了。隋唐时期，社会上流行以瓷为枕。盛夏时节，睡这种瓷枕自然凉气丛生。明清两代，瓷枕更是大行其道，乾隆皇帝曾作诗咏此乐事：“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

遁入山寺静心田

俗语云：“心静自然凉”。让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胸中的暑气自然消退不少。古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到盛夏，总有一些人呼朋引伴，到深山古寺中游玩小住。那里远离喧嚣闹市，茂林修竹，鸟鸣阵阵，花香缕缕，身处其中，有一种“浑然忘机”的感觉。宋代诗人梅尧臣在《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中就曾记录道：“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



发达的商品经济、丰富的社会生活、高雅的艺术审美……近年来，人们对宋代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文化娱乐领域，以宋代为背景的古装剧也纷纷热播，比如《清平乐》《大宋宫词》《知否》等，还有近期播出的《梦华录》，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宋代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不仅催生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创造了物质丰富的市井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社会变革，比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契约意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在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为购买“望月楼”签订契约、遵守契约的剧情，便体现了宋朝社会普遍形成的契约意识。下面，让我们从包拯审理过的一些案件入手，来了解宋代社会的契约风尚。

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时，曾经审理过一个颇受瞩目的“让金案”。一位家住京师的商人，将两箱金银缗帛寄托在友人处。没过几年，此人去世，那位友人于是找到托付人的儿子，想要交还财物。不料其子却因为父亲并未留下契证，也从未提及此事，拒不接受。两人推让甚久，没有结果。友人无奈之下，只好找到府衙，希望包拯能够决断此事。

宋人凡寄托财物，必订立书面契约，并在契约上注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甚至保管报酬以及费用计算方法。这种遇事必立约的习惯，是在宋代商业大潮的鼓动之下，逐渐形成的社会风尚。那位商人之子不敢随便接受财物，也是宋代契约关系广布民间并且深入人心的结果。

在宋代日常生活中，契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日益突出的社会联系。尤其在商业发达的汴京，几乎每一个百姓的名字，都有机会签押在契约上：田宅买卖、商品交易、雇用人力、房屋租赁、典当、借贷、寄托、承揽、委托、分家，甚至是租车船运行，也要订立书面契约，还须有保人，以确保租赁者按期归还。各种契约关系像一张网，将整座座城市编织为一体。作为网点上的每一个立约主体，市民感受到社会身份的平等趋势，同时，头脑中也慢慢地培养出一个新鲜的契约型生活观。

汴京每天吞吐着数量巨大的消费人群，其吃穿用度，都要通过商品买卖来解决。宋代调整了传统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已经出现了信用消费、资本借贷等具有近代化模式的商业形式。这些活动都需要设计完备、履行规范的契约制度来支撑。

宋代社会的

契约关系

张宇

在契约关系的普及中，前代一些专事杂役工作的雇工、女使等，参与订立买卖、租赁、雇佣等契约，其独立的身份与人格，从法律的角度获得承认。尤其是一些技艺高超的厨娘、绣工、歌伎等，商品经济对于专业人士的需求，使她们获得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可轻易地为自己争取到条件优厚的雇佣合同。契约制度的完备是商品经济推动的结果。订约人的广泛化与平民化，则代表着宋代城市超越前代，真正进入了契约关系的时代。

在那件纠结于缺失契约的“让金案”里，包拯最终令僭役勾索证人，验明究竟，将财物判给了商人之子。在全民皆商的汴京，差役们对于契约纠纷的处置早已驾轻

就熟，只是这种彼此推让的案子，少有前例可循。宋代繁冗的律法规条中，“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官府对民间的立约活动提供“官版契约”。凡缴税并盖有官印的契约，称为“红契”，反之唤为“白契”。“红契”为官方所承认，出现纠纷可作为审理依据，“白契”则没有法律效力，不被认可。于是，宋代标志性的叠叠大官印就随着汹涌的商业需求而被大量铸造，为宋代各业交易与物产交割提供了正式的身份认定，留下一方方朱红印迹。

然而，立约的普及与履约行为的严谨，便能够说明宋人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型的商业时代的门槛吗？在西方，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的基本文化。对契约观念的诉求，着眼于合约关系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独立、平等、自由等内在原则。而宋代契约所关注的依然是现实层面所能获得的商业效果与功利所得。契约制度的设计，止步在完善律法的约束力上。包拯在审结“让金案”后评价说：“观此事而言无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为尧舜’，盖观于此而知之。”包拯对于双方虽无契约却彼此推让的精神，给予了德行上的高度赞扬。契约关系在宋代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人们心中，守约的理念似乎更关乎道德。契约精神在商业大潮的变奏下，仍不过是儒家五常中“信”字的一个延伸。

当汴京商业的发展遭遇传统的精神，二者相冲相融、相克相济，从中成长起来的契约关系，便继承了他们共同的面目特征，只是后者的基因明显对其发挥着更深刻的影响。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对人心的滋养从来都胜过那一纸约束。